

談兩漢贗鼎詩歌（上）

侯紹文

孟子說：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」是古書中有贗品，如尚書一書，即有後人偽造者。文章中亦有贗品，如李陵答蘇武書，諸葛孔明之後出師表，說者皆為後人偽作，不過古今來之詩歌中，贗鼎之作，亦頗繁夥，尤以漢代婦女之贗品居多，茲試一一述列如下：

一、虞姬和歌：提到虞姬，先要表明虞姬的身世，有人說虞姬姓虞，也有說姓吳，名虞。如史記項羽本紀，即云項王有美人名虞。在稗史說：虞姬是吳興人，即今浙江省湖州。當秦之末世，陳勝、吳廣叛秦，楚人項梁率領著姪子項羽，亦起兵於越中。

在湖州府志上記載著一段故事：當項羽率領著子弟兵進攻吳興城的青銅門時，突然城門傾圮下來，眼明手快的項羽，一個箭步上去，恃其神力，用手托住了青銅門，救了不少子弟兵的性命。當時在樓頭觀戰的虞姬，對於項羽的神力，非常欣賞，遂決心委身相事。項羽當時，也見到虞姬，立告鍾情。

以虞、項兩家，原係通家之好，經人撮合，遂結為秦晉之歡。項羽之為人，不像劉邦有三妻四妾，項羽對虞姬，始終一夫一妻，即至西楚霸王時，亦不二色。而且項羽在軍中，虞姬常幸從，有駿馬名騶常騎之。當項王被漢兵重圍垓下。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，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，自為詩曰：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騶不逝，騶不逝兮可奈何？虞兮虞兮奈若何？」歌數闕美人之和。在史記正義註，虞姬和歌，為以下四句：

「漢兵已略地，四方楚歌聲，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。」

此和歌見載於楚漢春秋，字句之間，辭海所載虞姬和歌，與楚漢春秋相同。人名大辭典，虞姬和歌，則為：

「漢兵北略地，四面楚歌聲；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。」一二兩句，與楚漢春秋所載小有不同。

在近人胡軌著之中國通史，二三五頁，虞姬和項王歌曰：「漢兵已略地，四面楚歌聲；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獨生！」僅第四句與以上所舉不同。又有歌舞畢，引劍自刎。

在胡軌著之通史中，虞姬自刎以後，又說項王悲痛已極，英雄之淚，竟為之雙傾，高歌當哭曰：

「一見淚雙傾，一見淚雙傾，好教人箭穿心，俺今空有拔山力，不能保護一婦人。」

此一歌詞蓋為平劇中霸王別姬一幕，項羽唱之撲燈蛾曲詞，為編劇者擬作，可無多論；惟虞姬之和歌，對其真實性，不能不

就中國古代五言詩之發生經過情形，加以探討與研求。在中國古代，以四言詩為最多，如「詩經」。詩經中雖有一句兩句五言者，那不算五言詩，在漢武帝時，雖有李延年的「北方有佳人，絕世而獨立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，寧不知傾城與傾國，佳人難再得。」每句都是五言，獨有一句多出三個字「寧不知」，所以李延年之佳人歌，算不了純粹的五言詩。說者謂純正文人所作的五言詩，要到東漢班固的詠史詩，那才算真正的五言詩。詩句如下：

「三王德彌薄，惟後用肉刑，太倉令有罪，就逮長安城。自恨身無子，困急獨煢煢。小女痛父言，死者不可生。上書詣闕下，思古歌雞鳴，憂心摧折裂，晨風揚激聲，聖漢孝文帝，惻然感至情，百男何憤憤，不如一緹縈。」

這是歌詠孝女緹縈的故事，是一首短短的敘事詩，可是五言詩的形式，就完全成立了。由此詩證明五言詩，直至東漢才完全成立。楚漢之際，那能發生五言詩歌呢？是以劉勰在文心雕龍說：「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，朝章國采，亦云周備，而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。」是指西漢說的。在古詩源沈德潛也說：「虞姬和歌，有似唐詩絕句，決非虞姬作品。」是以未被採錄。

二、楚歌：史記項羽本紀有句為「四面楚歌」。此楚歌在古史傳說：有兩首之多，一為無名氏的雞鳴歌，其詞如下：

「東方欲明星爛爛，汝南晨雞登壇喚，

曲終漏盡嚴具陳，月沒星稀天下旦，千門萬戶遞魚鑰，宮中城上飛鳥散。」

史記集解，應劭曰：「楚歌者，謂雞鳴歌也，漢已略得其地，故楚歌者多，雞鳴時歌也。」

史記正義，顏師古云：「楚人之歌也，猶言吳謳越吟，若雞鳴為歌之名，於理則可，不得云雞鳴時也。高祖戚夫人楚舞，自為楚歌，豈亦雞鳴時乎？按顏說是也。」

因是知應劭以雞鳴歌為楚歌，實是錯誤的。又有一首楚歌見載於李方晨所著之中國通史，韓信之兵為楚歌，其歌曰：

「千里投軍實可哀！十年征戰不能回，家中拋得雙親在，朝朝暮暮盼兒歸，倘若戰死沙場上，父母妻兒依靠誰。」

此歌之不可靠處，有兩點：一為「十年」，一為「沙場」，在秦楚之際月表第四（見史記卷十六），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：「初作難發於陳涉，虐戾滅秦自項氏，撥亂誅暴，平定海內，卒踐帝祚，成於漢家。五年之間，號令三嬪，自生民以來，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。」僅五年從軍而云「十年」征戰不能回，豈非錯誤。又「沙場」二字，指戰爭接近北番蒙

古地方沙漠之戰場而言，自西漢武帝時，始用兵北方，遠出塞北沙漠地帶，始言「沙場」。在唐朝亦然，是以王翰涼州曲云：

「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飲琵琶馬上催，醉臥『沙場』君莫笑，古今征戰幾人回。」

如在秦漢之際，戰征地方，因戰國時代稱「戰場」，也該相沿稱「戰場」，今稱「沙場」亦是錯誤的。又漢初無七言詩句，此歌作為七言，故知為一贗鼎詩，出於後人代為捉刀者。

三、戚夫人善歌：在史記呂后本紀中，高祖為漢王時，得定陶戚姬。（定陶在今之山東省）自周以來，姬為婦人美號，故戚夫人亦如虞姬同為當時美人也。為高祖所愛幸，生子趙王如意，戚夫人恃寵，常有奪嫡之意，當時太子為惠帝，以張良之策而得保全。及高祖死，惠帝立，呂后常欲殺戚夫人及趙王。在趙王就國之際，呂后迺令永巷囚戚夫人，髡鉗衣赭衣令舂，戚夫人舂且歌曰：

「子為王，母為虜，終日春薄暮，常與死為伍，相離三千里，當誰使告女。」（女讀曰汝）此歌見漢書下卷外戚傳呂后傳。

按戚夫人之歌，為一破體之五言詩歌，即前邊為三言，後面為五言。此種詩歌體裁，到了西漢宣帝時代才有，漢初是不會有的。在宣帝時代，楊惲作的南山詩，也叫拊缶歌，（見漢書楊惲答孫會宗書）其歌曰：

「田彼南山，蕪穰不治，種一頃豆，落而為箕，人生行樂耳！須富貴何時。」

楊惲之詩，前邊四字一句，後兩句才為五言，此與戚夫人之善歌相彷彿。在漢初安得有此格調之詩，吾人涉想，假如戚夫人真會作詩，（或謂戚夫人曾作出塞、入塞曲，後經考出塞、入塞曲，為李延年始作，並非戚夫人所作。）她作詩的格調，不會超出三個範圍：一

是如漢高祖帶兮字的大風歌，與四言的鴻鵠歌，與唐山夫人的房中歌。

大風歌的歌詞如下：

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」

鴻鵠歌之歌詞如下：

「鴻鵠高飛，一舉千里，羽翼已就，橫絕四海，橫絕四海，又可奈何？雖有矰繳，尚安所施。」

唐山夫人，為漢高祖姬，姓唐山，生平及事蹟不詳。其房中詩（模詩經）共十七首，今錄其第一首如下：

「大孝備矣，休德昭明，高張四懸，樂充宮庭，芬樹羽林，雲景杳冥，金支秀華，庶旒翠旌。」

在漢書禮樂志說：高祖樂楚聲，常使戚夫人作楚舞，而高祖為楚聲，耳濡目染，戚夫人如能作歌，當然要如高祖或唐山夫人之範型，絕不會吟出五言破體如宣帝時代楊惲南山歌之體型。因此吾人可以推斷戚夫人之春米歌，可能是一贗品。

再有項王廟樂府一篇云：

「三章既沛秦川雨，入關更縱阿房炬，

漢王真龍項王虎，玉玦三題王不語，

鼎上杯羹棄翁姥，項王真龍漢王鼠。

垓下美人泣楚歌，定陶美人泣楚舞，

真龍亦風虎亦鼠。」

以上詩句見載於池北偶談。

詩中說：虞姬是美人，戚夫人也是美人，

西漢之美婦人，多半有人假託代為作詩，如虞姬、卓文君、細君、王昭君、李夫人、班婕妤、以至趙飛燕，都有文人學士代為捉刀。戚夫人既與虞姬同樣美，安可無假詩以資流傳，此是戚夫人春歌之所由作也。

四、古詩十九首：見載於昭明文選雜詩。

或云為西漢枚乘所作，乃據玉台新詠耳。

枚乘為西漢文、景時代人，死在武帝初年，漢書枚乘傳及詩賦略，只稱他的賦，未及他的詩。詩品也說他「辭賦競爽，而吟詠靡聞。」李善註昭明文選古詩十九首，「並云古詩，蓋不知作者」。又說：「昭明以失其姓氏，故編在李陵之上。」徐陵（作玉台新詠者）為蕭統晚輩，何所據而定為枚作？而且玉台新詠載陸機等人的擬作，均題曰「擬古」，而不說擬枚乘，詩品亦稱陸機所擬的幾首古詩「人代冥滅」，更可助證。」

以上證明古無枚乘作詩之說。即就各首本文而論，亦可知其非西漢詩。

又顧炎武的日知錄說：「枚乘詩，盈盈一水間（指十九首之第十首中句），在武、昭之世，而不避諱，（漢惠帝名盈）可知其為後人之擬作。」

又李善註昭明文選古詩十九首說：「詩云驅車上東門」（十九首之第十三首）又云：「遊戲宛與洛」（十九首之第三首，漢書南陽郡有宛縣，洛則東都也。）此則辭兼東都，非盡乘作明矣。

又「促織鳴東壁」（十九首之第七首明月

皎月光之第二句）之「促織」，其名不見於爾雅方言等書，時稱之為蜻蛚或蟋蟀。（如方言、鹽鐵論、蔡邕月令章句、呂氏春秋高誘註等。）至漢末緯書始見「促織」之名，（春秋考異郵及詩緯汜歷樞）故此詩必作於漢末。

又詩中有「王侯多第宅」、「兩宮遙相望」、「雙闕百餘尺」，（十九首之第三首）中國詩史說：「周室王侯不言第宅，『兩宮』『雙闕』亦似東京語。」

又詩云：「四五蟾兔缺」，（十九首之第十七首上句為三五明月滿）月中有兔，始於楚詞天問。月中有蟾，始於淮南子精神訓。而蟾、兔並居月中，則始見於張衡靈憲。漢末緯書（春秋元命苞及石闕少室神道石闕銘，及開母庙石闕銘）中，亦多以二物象月，此詩當亦漢末時作。

以上詩就各首本文句中有非西漢事實，加以抉擇，則知如徐陵編的玉台新詠說：在古詩十九首中，指「青青河畔草」等詩八首，再加「蘭若生春陽」一首，為枚乘之雜詩，是錯誤的。在沈德潛著古詩源中，註：「古詩十九首，非一人一時作，玉台以中幾章為枚乘作，文心雕龍以孤竹一篇為傅毅（東漢人）之詞，昭明以不知姓氏，統名為古詩，從昭明為允」。

以沈氏之註，從昭明為允，即是古詩十九首，並不知作者的姓名，而絕非出自枚乘也。

五、李陵蘇武詩：按李陵、蘇武詩共七首，李三首，蘇四首，均五言，見載於昭明文選，詩已、雜詩上。

關於李陵、蘇武的詩，那是千餘年來，久爭不決的問題，李詩的可疑處如下：

(一)、漢書李陵傳及詩賦略，均未提及他的五言詩。

(二)、文心雕龍說：「李陵見疑於後代」。(見劉勰明詩)可見很早李陵之五言詩，被人懷疑。

(三)、容齋隨筆卷四說：「予觀李詩云：『獨有盈觴酒，與子結綢繆』。盈字正惠帝諱，漢法觸諱者有罪，不應陵敢用之。」

(四)、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六說：「觀漢書李陵傳，置酒起舞作歌，初非五言，則知河梁唱和，出於後人依託。」

前漢紀(一六二頁)李陵置酒賀武(蘇武)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名揚於匈奴，功顯於漢朝，雖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足以過。子卿！陵雖漢且貴陵罪，得全其老母，得奮大恥之節，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，此陵宿夕所不忘也。今漢收族陵家，為世大戮，陵當復何顧乎？君已矣！知子卿知吾意耳！異域之人，一別長絕，陵起舞歌曰：『經萬里兮渡沙漠，為將軍兮奮匈奴，路窮絕兮矢石摧，士衆滅兮名已頹，老母已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兮』」

十駕齋養新錄：「引出李陵與蘇武別歌之意，是說李陵如作詩歌，也當如別歌之體型，帶如楚詞之兮字，絕無可能作出五言詩，如昭明文選所載之三首。」

(五)、文選旁證引翁方綱論：「『嘉會難再遇，三載為千秋』(此兩句為李詩第二首

，首兩句)二句的話，蘇李二子之留匈奴，皆在天漢初年，其相別則在始元五年，是二子同居者十八九年之久矣，安得僅云三載嘉會乎。」

由以上所引觀之，見載文選之三首李詩是贗品。以下再說蘇詩的可疑處：

(一)、漢書蘇武傳及詩賦略，均未提及蘇武的五言詩。

(二)、詩品引論西漢五言詩，已難了不少偽作，尚無蘇武之名。

(三)、宋蘇軾答劉沔書說：「李陵蘇武長安，而詩有江漢之語，正齊梁間小兒所擬作，決非西漢詩，而統不悟。」蘇武在文選有四首詩，其第四首中有句云：『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』。

(四)、顧實在中國文學史大綱中說：「世言五言詩起於蘇、李唱和，實不足據。」又云：「蘇、李之詩，擬作無疑。」

(五)、易君左在中國文學史中引鍾嶸所著詩品的要點第五，是評論詩歌的演進，約分八期，第一是五言詩的起源，他說：『五言見於周代，行露之章是也。按詩騷中，雜有五言句子，不足為五言詩發端的確證。』第二是，西漢詩，他說：『辭人遺翰，莫見五言。』可見西漢尚無五言詩。蘇李贈答及班婕妤詩，乃至古詩十九首，都不一定是西漢的真作品。

由以上所引觀之，則蘇詩亦為贗品無疑。

六、柏梁七言詩：即漢武帝元封三年，作

柏梁台，詔羣臣二千石，有能為七言者，乃得上坐。按東方朔傳，已有所作，今不可見矣。惟武帝柏梁詩相傳為七言及聯句之始，今錄其全詩如下：「日月星辰和四時，(帝)驂駕騶馬從梁來，(梁孝武王)郡國士馬羽林材，(大司馬)總領天下誠難治，(丞相石慶)和撫四夷不易哉！(大將軍衛青)刀筆之吏臣執之，(御史大夫倪寬)撞鍾伐鼓聲中詩，(太常周建德)宗室廣大日益滋，(宗正劉安國)周衛交戟禁不時，(衛尉路博德)總領從宗柏梁台，(光祿勳徐自為)平理清讞決嫌疑，(廷衛杜周)修飾輿馬待駕來，(太僕公孫賀)郡國吏功差次之。(大鴻臚壺充國)乘輿御物主治之，(少府王溫舒)陳粟萬石揚以箕，(大司農張成)微道宮下隨討治，(執金吾中尉豹)三輔盜賊天下危，(左馮翊盛宣)盜阻南山為民災，(右扶風李成信)外家公主不可治，(京兆尹)椒房率更領其材，(詹事陳掌)蠻夷朝賀常舍其，(典屬國)柱杵樽櫨相枝持，(大匠)枇杷檟栗桃李梅，(太官令)走狗逐兔張罝罟，(上林令)鬻妃女唇甘如飴，(郭舍人)迫窘詰屈幾窮哉！(東方朔)。此七言詩權輿，亦後人聯句之祖也。武帝句、帝王氣象，以下難追後塵矣！存之以備一體。篇中三字，三治字，二哉字，二時字，二材字。古人作詩，不忌重複，且如三百篇，株林一詩，四句中連用二林字、二南字。采薇首章連用猘狁之故句，此類不可勝數。三秦記：謂柏梁台詩是元封三年作，然梁孝王薨於孝景之世。又

光祿勳、大鴻臚、大司農、執金吾、京兆尹、左馮翊、右扶風、皆武帝太初元年所更名，不應預書於元封之時，此為後人擬作無疑也。不然大君之前，郭舍人敢狂蕩無禮，而東方朔以滑稽語為戲耶？

詩史說：「古文苑所載柏梁詩，但這些都是後人偽作，到賈充、陶潛、何遜，才有真的聯句。」

陳沅（詩比興箋卷一）以為武帝柏梁賦詩時事，殊無確據，若王先謙《漢鏡歌釋文箋正》說：武帝祀舜而作歌，則更無稽。（顧炎武說：武帝之柏梁詩，係後人假託。）

至於純粹七言詩之始，為曹魏文帝（曹丕）之燕歌行，早見載宋書志十一、秋風、燕歌行，其詞如下：

「秋風蕭瑟天氣涼，草木搖落露為霜，（

一解）羣燕辭歸鷓鴣南翔，念君客遊多思腸，（二解）慊慊思歸戀故鄉，君何淹留寄它方，（三解）賤妾斃斃守空房，憂來思君不敢忘，（四解）不覺淚下霑衣裳，援瑟鳴弦發清商，（五解）短歌微吟不能長，明月皎皎照我床，（六解）星漢西流夜未央，牽牛織女遙相望，爾獨何辜限河梁（七解）。」

（商務政什叢書）

社會學·界限與局限

畢浩明 主編

90元

本書為七位香港新一代社會學家最新研究成果，以不同之觀點探討社會學的界限與局限，介紹社會學中最受重視之各種理論，並具體分析社會現象中之主要問題。

（商務政什叢書）

人的哲學——論「科學與理性」的基礎

金觀濤 著

81元

大陸當代思想家金觀濤最新力作，採用控制論、神經生物學、心理學、物理學等科學理論，深入探討人在自然中之位置、主客體之相互關係，闡釋最基本和核心之哲學問題，進而重建理性之哲學。議論精深，文筆暢達，引人入勝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台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一段37號
電話：311-6118-311-5538
郵政劃撥：000165-1號
傳真：(02) 3710274